

● 导 论 ●

走向 21 世纪伦理学的重要使命

走向 21 世纪，对跨世纪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决不只是单纯的时间上的跨度，而是具有深沉社会内涵的历史超越。它意味着一个现代化新时代的构建和一代新人的塑造。因此，当我们站在跨世纪的入口处再度观照自我、审视自我，提出和思索“我是什么”；“我应当是什么”；“我能够成为什么”等问题的时候，不是出自书生意气的玄想和多愁善感者的无病呻吟，而是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为了自身完善和超越自我的一种应有的积极姿态，是我们面向未来必然遇到的一个深层次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个课题中，个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素质和人格价值，无疑占着核心的地位。研究和阐明个体道德诸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时代使然，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伦理学自身发展逻辑要求的重要使命。

一 新技术革命的热门话题： 关于“人的革命”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

展的历史。’^①这一论断本身就包含着另一个重要的论题,即“个人发展的历史”也必然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历史”。所以马克思又强调:“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和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②马克思这一关于个人的发展同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启示我们,不但人的道德本身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且研究个体道德也必须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正是当代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提出了研究个体道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从当代全球性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

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巨大突破的阶段。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特点是:科技对生产过程的渗透越来越深;科技在产品中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各学科构成立体网络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科技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这些基本的事实说明,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人的体力劳动将越来越被自然力和科技装置的利用所代替,人们依靠受人控制的物化知识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必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脑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极大地改变着生产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

整个结构和成分，改变着劳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了。同时又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生产管理、人的教育、日常生活、文化、道德、心理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可以说，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它的社会后果扩展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它在社会的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引起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到底从哪里来呢？这就要回到人自身来。

我们知道，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所谓科学技术，不过是人 对客观物质运动及其相互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控制自然界能力的提高，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突出表现。离开了人的创造精神，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 有当代的新技术革命。反过来，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又必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代新技术革命在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重大变化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它有力地驳倒了那种把历史的客观性看成某种彼岸的、在人之外的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它深刻地证明了下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历史的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① 人们的主动性应当成为“必然事变链条中的一环”，因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始终需要由人来干预的，因此，人们担负着伟大的社会任务’。^② 的确，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们积极影响历史事件进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6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338、374 页。

在前所未有的扩大。可以说，在当代，社会的继续发展，人类的未来，人们既要依据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也要诉诸于自己的手段和能力，人们应当到自身之外和自身之中去寻找有把握的行动、实现自己目的的根据和力量。

因此，无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说，当代人的社会责任都空前地扩大了。我们知道，人的社会责任不是抽象的、无限制的，它始终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和范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人类每一次实践活动的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的选择范围和选择能力的扩大，因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而扩大。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尖锐。这是因为：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括的一切消极的后果，在当代正在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造成了当代的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和人口危机等五大全球性危机；新技术革命又为我们消除这些消极的后果，克服这些危机，迈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而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发展的节奏，则使选择的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关于这些，可以从遗传工程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得到充分证明。1972年，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伯格在自己的实验中用 DNA 连接酶把两种不同来源的 DNA 片段连接起来，组成一种新的自然界原来没有的基因。伯格的成就标志着遗传工程的诞生。然而，就在伯格的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他毅然地中止了自己的实验。1974年他联合美国其他几位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发出呼吁：要求在社会没有确立有效的安全对策之前，暂停某些 DNA 的重组实验。为什么？因为伯格深深地意识到，在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遗传工程将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巨大的潜在威胁：它可以被利用制

造‘基因武器’，这种被称为‘世界末日’的武器，其威力将远远超过核武器；它也可以因为人类能够用此设计出新的生物而造成“生态爆炸”；它还可能因为不慎泄露而使人体中原来无害的大肠杆菌变成致癌或致病的病源。这些都可能对人类酿成无可遏止的灾难。

可见，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人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人类整个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不能不变得空前尖锐。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担负着如此伟大的任务！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明天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集中地表现为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这就是：人们必须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如果说，在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时代，那时由于四季轮作的劳动方式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观念。在这个时代里，时间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历史表现为改朝换代的重复；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都是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循古制、法先王、守祖宗之法，按传统办事，一句话，对过去负责。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因循守旧的封建主义传统，资产阶级在广阔的现实领域中创造和建设了自己的物质文明，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把冷冰冰的现实利益提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个人本位主义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价值的核心。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只是鼓励人们争取现实的

成功，因而事实上鼓吹人们只对自己的现在负责，既无需顾及过去，也无需顾及未来。那么，到了当代，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就再不能如此了。未来的问题如此尖锐地提到了当代人的面前、因为人类的作用变得如此巨大，以至几乎可以说，未来就是人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怎样选择和创造未来，成了当代人不可回避的重大责任。这就无怪乎一些西方的学者也认为，“责任范围不断扩大”是新技术革命时代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①西方罗马俱乐部主席雷利奥·佩西说：“人类从全球规模面向未来，这还是第一次，人类能够如此完整地掌握未来，能够为今后几个世纪制订全球这艘太空船的航道，这也是第一次，这是既令人高兴又令人惊恐的事。……我们正处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地位，负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如果我们无知、疏忽、目光短浅和愚蠢，那么我们将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②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谓“人的革命”便成了一个牵动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对于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的西方人士来说，“人的革命”只是被单纯地理解为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他们主张用一种所谓新人道主义思想或重新唤起人的宗教热情来改造人，使人能够谨慎地对待科学技术，作出正确的选择，重视精神的价值，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友谊、谅解、团结、牺牲精神和健康的交往等传统美德，以避免新技术革命所可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和未来。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在西方世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

①〔联邦德国〕H·伦克：《当代的哲学、伦理学和人的技术活动》，《哲学译丛》1985年第2期。

②《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的革命”的议论不断升温的同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光怪陆离的图像：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精神的道德的危机日益加深。色情书报、吸毒、犯罪、精神病、性放荡、家庭解体、同性恋、自杀风等等，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罗诺德·汤茵比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他们为了自己的福利而丧失了自由和幸福。”^①而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更是惊呼：随着物质空间的不断扩大，道德的空间却越来越缩小，“人的个性在全面堕落”^②。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出路何在呢？有的正直的西方学者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控制论的创始人，当代杰出的科学家诺伯特·维纳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不能从市场的观点，从节约了多少钱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可能性……出路只有一条：建立一个以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③维纳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接触到了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社会制约性问题。而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他所说的那种“以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这个社会把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买和卖、供和求的关系，即使是良心、荣誉、友谊和爱情等人类一切传统的精神价值也都变成了商品，可以用金钱买到。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关系，这就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关系。自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善’的无限可能性必然被扼杀，而把‘恶’的无限可能性日益变成现实性。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纯粹“消

① A·汤茵比：《活着比将来还长》，伦敦1971年版。

② H·维纳：《控制论》，莫斯科1986年版，第76—77页。

费人”或“享乐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证明。这同西方一些人士所热衷谈论的“人的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深刻地证明，所谓“人的革命”决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点，显然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是讳莫如深的。而维纳却有实际的体会。他曾经呼吁：资本家应当通情达理，了解到如果盲目地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就将对人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存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但是他认识到，这种呼吁和规劝是不能奏效的。所以他说：“我们 also 知道，当谈到可以从工业中获得最大利润（只能从中拿出一点残羹冷饭供社会利用）时，那么什么办法也是抑制不住工业家的。”^①

那么，维纳所希望的那种“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才能避免和防止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恶”的无限可能性的产生，使“善”的无限可能性日益变成现实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开辟了人的发展的新方向，使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开始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②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为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那种技术对劳动者的支配和奴役状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真正确立劳动者对技术的支配地位，使新技术革命成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更为人的自由全

① H·维纳：《控制论和社会》（俄文版），1985年版，第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面发展，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提供了精神保证和价值依据。所以，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人的革命”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获得它的真实的历史内涵和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述人的责任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人的革命”能够自发实现，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能够自发产生，那也是十分天真、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的不发达，科学技术的落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继续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斗争等等，都向我们表明，要适应当代新技术革命发展所提出的上述客观要求，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不仅是一个必须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艰巨历史过程。这是一种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空前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看不到这一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和紧迫性，无视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那么，在这个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浩大的社会工程中，伦理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知道，伦理学是对社会道德现象的理论反思和哲学考察。道德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本质的规定性，始终是同人的责任、义务相联系的。黑格尔说：“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了自己履行义务这样一种意识。”^①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所谓人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人的革命”问题的提出，都离不开人的道德。从一定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意义上讲，正是道德问题构成了当代人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人的革命”问题的深层内涵。因此，作为科学的道德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仅应当为跨世纪的当代中国人提供关于道德的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评价标准的体系，从而为社会价值导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方针，而且应当依据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经验和规律，阐明个体在当代发展的道德方向，揭示履行社会责任在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化的道德机制和道德目标。这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能适应当代新技术革命的需要，促进这一革命的深入发展。所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个体道德问题，是时代使然，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的革命”问题的产生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所必然提出的要求。

二 改革开放的伦理反思： 自我和主体性问题

当我们把眼光从世界转向中国，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进，更是把个体道德的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面前。揭示个体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塑造社会主义个体道德人格，是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保证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深入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

坚持改革开放，是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振兴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这已经成为我国各族人

民的共识。但是，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身的变革，意味着新人格的塑造，这一深层的人格内涵却并不是为所有的人都自觉地意识到了的。事实上，所谓社会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说到底，都是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关系制度化了的固定形式。改革旧的体制，确立新的体制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人的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行为方式的转型和社会关系的改造的过程，这一切都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牵涉到人的道德世界。而所谓对外开放，就是要打破封闭性，克服保守性，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也必然引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并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而带来资产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侵袭。因此，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道德领域矛盾斗争的激烈过程，是一个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实现人格转型的过程。为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导向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加强个体道德的研究，促进新的社会主义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生产商品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这无疑有待于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人的创造精神的发挥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事实上，我们一切改革开放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所谓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体性，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具体社会内容的，它始终存在一个道德价值取向的问题。的确，我国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观念。诸如功利意识、效率意识、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等等的启动和发展，就是个人的积极性、

创造性和主体性得以发挥的表征。但是，这些观念形式都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内容，具有不同的价值性质，它们既可以归属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又可归属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在资产阶级及其受资产阶级影响和腐蚀的人看来，所谓功利意识，无非就是个人私利的获得 所谓效率意识，只能以‘金钱’的多少为唯一尺度和目标；所谓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则被理解为个人本位主义的同义语 而所谓竞争意识，在实际生活中就意味着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弱肉强食。由此可见，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各个人赋予它什么性质的价值内涵，都要打上其个体道德人格的烙印。而这一情况又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得特别突出和尖锐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领域，绝不是一块纯而又纯的圣地，而是一个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下、真善美与假恶丑共生共长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各种因素组成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方面并存，共属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就道德价值体系而言，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在地位、力量和作用方面占着明显优势，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并不缺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两个方面并存和对立虽然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从总体上讲，又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和水平，就是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导向是十分重要的。但社会的价值导向并不等于个人实际行为的价值取向。个人实际行为的

价值取向要经过个体的自主自觉的道德选择，它决定于其个体道德的状况和个体道德人格的特质。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充分发挥其在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的功能，就不仅要研究社会道德问题，而且要研究个体道德问题；不仅要研究社会道德同个体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且要研究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塑造个体道德人格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理论是实际的反映，理论上的混乱又必然反过来加剧人们实际中的困惑。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 80 年代所出现的关于“自我”“主体性”等问题的争论，也要求我们加强个体道德的研究，以澄清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是非，为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本来，关于“自我”“主体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已有明确的论述，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说：“人起初是以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①这就是说，“自我”作为人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观念把握，始终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确立的。“自我”无非是指组成社会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着的活生生的个体或个人。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和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自我”便无法存在，也无法确证，就是“自我”的独特性，即个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一种经验证明，虽然与每个人的自然属性有关，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7 页。

它们也是一种已经社会化了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又说：单个人“是一种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一个个体，成为现实的、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物。”^①所以，在自我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肯定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但它始终强调二者相比，社会占着较个人更为根本的地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科学事实。

同样，在‘主体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阐明，所谓主体性，就是使人成为实践活动主体的规定性。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②这就是说，主体是一个关系的范畴，只有发生了主客体关系的地方，才有主体。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是在他同自然、社会以及他自身发生了主客体的关系中确立的。马克思又说主体“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③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是因为人是具有实践能力的客体对象的能动改造者，是人的社会实践才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人作为主体的属性，即人的主体性。而既然人的主体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由于实践始终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人的主体性也始终是社会的、历史的。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抽象的人，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孤立的、抽象的主体和主体性。黑格尔说：“人就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④可见，人的主体性，概括地说，就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实践活动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具体到道德领域，道德的主体性作为使人在道德活动中成为主体的性质，则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即以社会和他人的活动为载体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自我’、‘主体性’和‘道德的主体性’的本质规定，是为生活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也是一个没有唯心主义偏见的人能够理解的。可是在 80 年代的关于‘自我’、‘主体性’和‘道德主体性’的争论中，一些人却无视这种基本的科学事实。他们在改革开放、“观念更新”的旗号下，鼓吹“寻找自我”；恢复人的主体性”所谓‘主体论伦理学’就是这股思潮在伦理学领域中的典型代表。这种理论宣扬‘价值重估’；道德重建’；伦理转型’，攻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反自我’；反个人利益’，压抑了‘人的主体性’，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认为‘个人是最真实、最根本的主体’；道德的主体性就是道德的个体性，是个体“从我出发的，基于‘利己’的自然必然性”；是自我满足、自我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道德肯定性。强调只有这样来规定道德的主体性，道德才能成为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形式。就是在这种理论的鼓噪下，改革开放所激发的人们的功利意识，被解释为“功利主义从一般意义上说，其行为动机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归宿的”。自我意识被曲解为‘强调‘自我’就必须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结论’。于是“为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正名”；一切‘为我自己’；我只服从我自己”；甚至“金钱万岁”等等口号喧嚣一时，使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深受影响，走入误区，以为这就是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所要求实现的“观念更新”。

80年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这场关于‘自我’主体性’道德的主体性’的思潮,涉及面十分广泛,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它使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曾一度面临着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误入歧途的危险,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以澄清其理论是非。这具体到伦理学上,它不仅要求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宣传,而且要求我们科学地深入阐明个体道德的实质,揭示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规律,指出个体道德人格完善化的现实途径和科学方法,明确个体在道德上超越自我的必然和自由的正确的时代方向。

所以,如果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要求一种“人的革命”与之相适应,那么,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则必须以澄清各种理论是非,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和塑造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为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两股并行不悖的时代潮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层涵义,都有一个个体道德问题,都必须加强对个体道德的研究。

三 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逻辑:

从宏观到微观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因。能否倾听实践的呼声,满足实践的需要,决定着理论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学问,必须承担起对个体道德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这不仅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需要,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身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的内在逻辑要求。满足和实现这一要求，则是走向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须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研究道德，把道德当作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系统地、创造性地研究和把握。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把握，就不会有对人类道德生活现象的本质上的合乎规律的洞察和了解，就不会明了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总体要求，也无法弄清我们时代的道德必然和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应当”是什么。但是，仅有这种宏观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导向，还必须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和研究领域，从宏观方面进入微观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即同时从个体道德方面研究道德发生发展的规律。没有微观方面的系统而卓有成效地研究和探索，它就可能在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塑造和自我塑造上无所作为，以致减损它应有的价值和生命力，造成它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缺失。这样，把‘个体道德’纳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范围，科学揭示个体道德的本质、构成和功能，阐明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总体使命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和使命。

我们强调要把研究个体道德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伦理学自身发展而言，还基于这样一些事实：第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而道德就其存在形态而言，本身就是以‘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个方面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社会现象。道德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类整体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是个体意识形态和个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个体道德